

关于《文苑英华》

李致忠

1995年秋季,中国嘉得拍卖公司为拍卖一册宋版《文苑英华》,事先做了大量竞卖宣传。结果此书以120万元人民币的竞价,被马来西亚人买走。为此,引起很多文化人遗憾。在其拍卖前后,许多人大谈《文苑英华》,乃至于撰文评介《文苑英华》,一时成了文化、新闻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其中有些说法,文章中有些提法,并不完全准确,乃至于完全不准确,所以有必要全面谈谈《文苑英华》,供关心此事者借镜。

一、《文苑英华》的编纂

公元960年元旦,五代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领兵北征。军至陈桥驿,赵匡胤依仗手中的军权导演政戏,于是一夜之间,黄袍加身,面南称帝,建立了赵宋王朝。正因为赵匡胤是这样得的天下,所以他深知军将的厉害,生怕拥兵自重的将帅也效法自己,逼宫夺权,自己再失去天下,故不久又演出了“杯酒释兵权”的把戏。从此底定了宋代的基本国策——“重文轻武”。太祖如此,跟随他南征北战,多有开国之功的弟弟赵匡义,在他死后赚得了皇位,继续贯彻这一政策。“臣伏观太宗皇帝丁时太平,以文化成天下。”^①证明他确实仍是如此。宋太宗自己还有一句名言:“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②这不仅反映了宋太宗在发扬光大宋太祖的重文轻武政策,还说明他对历来统治者文治武功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也是

历来统治经验的高度概括。国策如此，诏修大书，便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了。

宋太宗一共在位二十年（976—997），而其诏修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却集中在太平兴国年间。也就是他御极的前十年。可见他“右文”政策的急迫。《太平御览》一千卷，诏修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藏事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平广记》五百卷，诏修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翌年八月竣事。监修同修均为李昉、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宋白、王克贞、张洎、董淳等。而正在这两部书的编纂落地或将要落地时，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又下诏抽调《太平御览》的监修同修官员李昉、扈蒙、宋白、徐铉等，动手编纂《文苑英华》，后又命苏易简、杨徽之、王祐等参修。《宋会要辑稿》谓：“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直学士院徐铉、中书舍人宋白、知制诰贾黄中、吕蒙正、李至、司封员外郎李穆、库部员外郎杨徽之、监察御史李范、秘书丞杨砺、著作佐郎吴淑、吕文仲、胡汀、著作佐郎直史馆战贻庆、国子监丞杜镐、将作监丞舒雅，阅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类分之，为千卷。雍熙三年十二月书成，号曰《文苑英华》。昉、蒙、蒙正、至、穆、范、砺、淑、文仲、汀、贻庆、镐、雅续领他任，续命翰林学士苏易简、中书舍人王祐、知制诰范杲、宋湜与宋白等共成之。帝览之，称善，降诏褒谕。以书付史馆。赐器彝各有差。”^③可见太平兴国年间三部大书同时诏修，其目的显然是要在“武功克敌”之后，急需“以文德致治”。也就是周必大所说的，太宗是要“以文化成天下”。此为《文苑英华》等三大类书修撰的政治和政策背景。

《文苑英华》可以看作是昭明《文选》的续作。《文选》收文起自先秦，迄于南朝梁初。《文苑英华》收文则起自南朝梁末，迄于唐末五代。其中收梁末至隋文约占十分之一，唐文约占十

分之九。于《文选》可谓承上起下，继往开来。但由于这是一部大书，选文的历史跨度也大，驾御起来已很困难。加之“右文”政策的急需，仓猝上马，急于求成，这就难免粗制滥造。而纂修诸臣，如扈蒙、宋白、吕蒙正、杨砺、苏易简等等，又都是词章之士，并非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如此浩繁细密的工程，靠这么一些人实际操作，弃取失当，分类失调，体例驳杂，就十分难免了。如《文苑英华》选录大量的诏诰、书判、表疏、碑志、律赋、试帖诗、策论、公牒等，就很令人费解。不是说这类东西没有好文章，而是说将这些东西当作精粹收入《文苑英华》就极不妥贴了。即便是赋、诗的选录，也极失标准。有些赋诗不但内容贫乏空洞，在艺术上也堆垛辞藻，敷衍成文。连一般封建选家的标准也没达到。清代李慈铭就讥评《文苑英华》“陈陈相因，最无足观”^④。而在另一方面，一些为历来选家都不肯放弃的名篇，千卷巨帙的《文苑英华》反而摒而不录。如李白的《朝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三吏》、《三别》、《诸将》、《咏怀古迹》等名篇，《文苑英华》全部失收。宋之问的诗选了一百三十多首，柳宗元的诗则只选一首。这种该有则无，该无则有的滥收尺度，造成了《文苑英华》又滥又缺的选录结果，从而大大降低了其自身的学术、资料价值。所以这部书在明清两代并不为学术界所看重，利用也极不普遍。像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对它就不怎么注意。

从编纂体例上看，也一袭《文选》的分类原则，将所收作品分为三十八类，每一类中又分为若干门目。这种分类方法把作品分割入类，使人无从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且，这种分类也难做到科学恰当。例如赋、诗、文的区别在于文体，中书制诰和翰林制诏的区别则在于对象与作者身分。一种分类同时采用两种原则，是分类学上的大忌。足见《文苑英华》在编纂的用人

上，在文选的弃取上，在分类编排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尽管书成进览，太宗称善，降诏褒奖，实际上却被长期搁置了起来。

二、《文苑英华》的校勘

由于“右文”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用人不当，《文苑英华》不但在弃取编排上存在严重缺陷，在文字上也鲁鱼亥豕，舛谬颇多。故在成书后二十年，也就是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便又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校勘。《宋会要辑稿》称：“景德四年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文苑英华》，以前所编次未精，遂令文臣择古贤文章，重加编录。芟繁补阙换易之，卷数如旧。”^⑤可证《文苑英华》于太宗雍熙三年十二月（987年）编完进呈后，到真宗景德四年便发现其所存在的问题，故重新分官校理。这次校理，又重新选取了一些古贤的好文章，替换了一些原不该收录的拙劣文章；删去了一些繁文冗章，补进了一些缺漏的文章；并对收录文章重行编录，使体例也有所调整。又过两年，也就是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又令工部侍郎张秉、给事中薛映、龙图阁待制戚纶、陈彭年校之”^⑥。可证在真宗时不但对《文苑英华》重新编录过，还又组织力量对它进行校勘过。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次对《文选》、《文苑英华》校勘后，“未几，宫城火，二书皆烬”^⑦。这就是说，真宗时对《文选》和《文苑英华》所花费的心力，都付之一炬了。十多年后，也就是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才又由“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校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天圣七年十一月版成，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校对焉。”^⑧证明，在真宗时宫中失火后，《文苑英华》就再未有人提及了，而《文选》则确是由三馆雕版印行了。

南渡以后，高宗中兴，文事继续受到重视。至孝宗赵昚又命儒臣校勘过《文苑英华》。这次校勘《文苑英华》的起因，是孝宗先欲刻江钿《文海》，周必大回奏此书去取差谬，不足观。孝宗于是乃诏馆职袁集《皇朝文鉴》，周必大又就此提出了《文苑英华》。他说《文苑英华》“虽秘阁有本，然舛误不可读”。孝宗皇帝遂“传旨取入，遂经乙览”。故命校勘官员再次校定《文苑英华》。但“时御前置校正书籍一、二十员，皆书生稍及文墨者，月给少钱，满数岁补进武校尉。既得此为课程，往往妄加涂注。缮写装饰，付之秘阁，后世将遂为定本。”^⑨所以这次校勘仍然是敷衍塞责，无足凭信。

南宋庆元初年，周必大致仕告老，摆脱了繁忙的政务，故又由他主持，再次对《文苑英华》进行校勘，才算最后有了定本。

“晚幸退休，徧求别本，与士友详议，疑则阙之。凡经史子集传注、《通典》、《通鉴》及《艺文类聚》、《初学记》，下至乐府、释、老、小说之类，无不参用。惟是元修书时历年颇多，非出一手。丛脞重复者，首尾衡绝。一诗或析为二，二诗或合为一。姓氏差互，先后颠倒，不可胜计。其间赋多用员来，非读《秦誓》正义，安知今之云字乃员之省文。以尧韭对舜荣，非《本草》注，安知其为菖蒲。又如切磋之磋，驰驱之驱，挂帆之帆，仙装之装，《广韵》各有侧音。而流俗改切磋为郊课，以驻为驱，以席易帆，以仗易装。今皆正之，详注逐篇之下。不复徧举。”^⑩可见这次校勘是动了真格的，于是也就有了真水平。

周必大主持的这次校勘，使《文苑英华》第一次有了定本。其学识、功劳固不可没。但任斯役并真正做事的，乃是彭叔夏，而并非周必大。中国的学术史上总产生这种悲剧，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产生着。周必大主持校定《文苑英华》，实干者本是彭叔夏，他却只说“与士友详议”，而不直书其名，令人不快。

还好，今世传宋版《文苑英华》每卷后都镌有“登仕郎胡柯乡贡进士彭叔夏校正”的衔名，算是周必大还未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彭叔夏也是庐陵人，与周必大为同乡，光宗绍熙（1190—1194）中只中了个举人。庆元初年周必大致仕还乡，主持校勘《文苑英华》时，他正年富力强，所以多干实事。彭叔夏很有心计，也有一定水平，又亲莅实任《文苑英华》校勘之役，故当《文苑英华》校定付梓之后，他的《文苑英华辨证》十卷也就问世了。并且历来被誉为考核精密，用意谨严。所以彭叔夏的功劳也没有被埋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文苑英华》自北宋雍熙三年十二月（987年1月）编纂藏事，至南宋嘉泰四年（1204）定本梓行；前后共历二百一十七年，才得以面世。而在这二百多年中，一部编纂粗糙的《文苑英华》，却经历了规模大小不同的四次校勘。前三次校勘，没得出任何结果。最后一次由于是周必大主持，严肃认真地进行，才有了较为可信的传本。

三、《文苑英华》的刊本

《文苑英华》在中国历史上到底刻过几次，北宋是否刻过，历来说法不一。依据前引《宋会要辑稿》的说法，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八月，曾下“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如果只断章至此，似乎北宋的内府好象刻过《文苑英华》。其实这只是皇帝的诏令，并不是事情的结果。诏办与办成之间是一定要有过程的。而过程中常常产生意想不到的枝节，影响结果未能执行诏令。《文苑英华》在这次校勘过程中就出现了这类问题。一是没预想到“《文苑英华》以前所编次未精”，故只好“令文臣择古贤文章，重加编录”。且“芟繁补阙换易之，卷数如旧”。这样一来，光《文苑英华》的校勘就迁延日久了。果然，李善《文选》校勘先行毕工，故“先令刻

版，又命官覆勘”。只可惜，“未几，宫城火，二书皆烬”。可见《文苑英华》校勘根本未完，便失火了，根本就谈不上“摹印颁行”，所以不可能有北宋内府刻本。直到天圣中，因为李善注《文选》规模小，又“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所以又由三馆书籍刘崇起建言重行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天圣七年十一月版成”。这充分证明自景德四年开始，直至天圣七年年末才完成的校勘雕印工作，只是完成了《文选》的“摹印颁行”，《文苑英华》则不了而了之了。

傅增湘先生于1930年见到南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时，曾撰写题记称“此必为蒲叔献蜀中初刻进御之本”。1939年在《校本文苑英华跋》中又说此本“版幅宽阔，镌工雅丽，当为官刊之定本”。傅先生这两个判断都不准确，并给后来鉴定此本造成了一些误导。考蒲叔献，南宋南邵人，第进士。尝为成都漕，有善政，百姓称之，召为中正卿。至韩侂胄用事，遂离去。说他在成都刻《文苑英华》，那只是个说法，实际绝无可能。傅先生当年所见之本，已是非首非尾的零帙，凭经验，看风貌，做推断，当然容易定错。其实《文苑英华》自宋迄今，只有两次刊板。一次是南宋嘉泰间周必大吉州刻本，一次是明隆庆元年胡维新、戚继光福建刻本。

传世的《周益忠公集》中收有《平园序稿》，《平园序稿》卷十五收有周必大撰写的校刻《文苑英华序》。这篇序文谈到“太宗丁时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诸国图籍，聚名士于朝，绍修大书，曰《太平御览》，曰《册府元龟》，曰《文苑英华》，各一千卷。今二书闽、蜀已刊，惟《文苑英华》士大夫家绝无而仅有。盖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间存一二。是时印本绝少……，故修书官于宗元、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辈或全卷收入。当真宗朝，姚铉铨择十一，号《唐文粹》，由简故精，所以盛行。近岁唐文摹印浸多，不假《英华》而传。况卷帙浩繁，人

力难及，其不行于世固宜”^①。这段话有四层意思：一是说《文苑英华》百分之九十收的是唐文，且很多是全书收入，奇轻奇重，不够全面；二是《文苑英华》编纂告竣不久，姚铉便从中精选出另一种书《唐文粹》，流传近远，人们用此即可，无求于《文苑英华》；三是进入宋代以后，刻书出版事业日盛一日，唐人文集之摹印也逐日浸多。欲读唐文，有此类单行本足矣，亦无须再求助于《文苑英华》；四是《文苑英华》自身卷帙浩繁，抄写雕印均非易事。有上述这些原因，所以《文苑英华》始终没有流传开来。南宋孝宗时曾有袁集《皇朝文鉴》之旨，周必大因之提出了校勘《文苑英华》的建议。但由于《文苑英华》自身问题太多，校勘人员又不得力，所以徒劳而无果。直到庆元初年，周必大晚幸退休，于是才得暇组织力量重行校正，付之剞劂。周必大称：“始雕于嘉泰改元春，至四年讫工。”其目的是“盖欲流传斯世，广熙陵右文之盛，阜陵好善之优，成大臣发端之志”^②。落款是嘉泰四年“七月七日具位臣周某谨记”。这显然是《文苑英华》雕板告竣之际撰写的。它清楚地告诉人们，《文苑英华》之首刻是在南宋嘉泰元年（1201）至四年（1204）。主刻人是致仕老臣周必大。刊板地点是今江西吉安。这就是95年嘉得拍卖公司拍卖的那册宋板《文苑英华》的原始由来。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晚年自号平园老人。其先是郑州管城人，后徙居庐陵，遂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北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卒于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虚度七十九岁。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周必大虚岁二十五便登进士第，又中博学宏词科，教授建康府。孝宗时除为起居郎，应诏上十事，皆切时弊，权给事中，缴驳不避权幸。后拜为右丞相，封为益国公。光宗问当世急务，奏用人，求贤二事。宁宗即位，求直言，又奏四事。庆元元年（1195），七十岁的周必大告老致仕，荣归故里。周必大一生除从政外，便是著书立说，关心文

事。有《平园集》二百卷及《玉堂杂志》、《二老堂杂志》等八十余种著作传世。于印书刻书，更是不遗余力。南宋绍熙四年（1193），周必大在写给他的朋友程元诚的信中曾说：“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⑬光宗绍熙初年，周必大曾出判潭州（今长沙）。此时他已是六十六、七岁的人了，但仍利用短暂外任的宽松，根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制造了泥活字，并用它摆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玉堂杂记》是笔记性职官类的书。“必大受知孝宗，两入翰苑，自权直院，至学士承旨，皆遍为之。凡玺坡制度沿革，及一时宣召奏对之事，随笔记录，集为此编。”^⑭这样一部小书，周必大却在出判长沙时亲自主持用铜版泥字摆印了它。可证他对文化出版事业是极有兴趣的。

庆元元年（1195），在宁宗即位求直言又奏对四事后，致仕还乡，颐养天年。按说以他的身分地位，完全可以赋闲享受，不再做事。可他摆脱了繁忙的政务之后，却抓紧主持完成了两项规模较大的刻书出版工程。一项是在他退休的第二年，也就是庆元二年（1196），便由他主持刻印了北宋欧阳修的集子《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此本，北京图书馆至今仍有珍藏。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学贯古今的文人，又是政绩斐然的名臣，又是周必大的同乡（欧阳修也是庐陵人）。乡里先贤，备受周必大尊崇，故不惜年迈，躬自主持雕印《欧阳文忠公集》。

也许是他有了刻书的实践经验，所以在他刻完这部欧集后，可以说是马不停蹄，便着手组织力量，校勘《文苑英华》。正如前引他自己的话所说：“晚年退休，徧求别本，与士友详议，疑则阙之。凡经史子集、传注、《通典》、《通鉴》及《艺文类聚》、《初学记》，下至《乐府》、释老、小说之类，无不参用。”到嘉泰元年（1201），大规模的《文苑英华》校勘工作告竣，书稿付梓。至嘉泰四年（1204）的秋天，历时三年多，一千

卷的《文苑英华》雕板完毕。同年年末，周必大乘鹤仙逝，含笑九泉。这就是《文苑英华》的宋刻本，也是《文苑英华》首刻本。

此本开版宏朗，颇似官雕。每半版十三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方镌每版字数，下方镌刊工姓名。完全是宋时刻书的风貌。宋时全国有三大刻书中心：浙江、四川、福建。其实宋代江西刻书，论书品质量，决不亚于上述任何一个地区。这就是《文苑英华》编纂以来的第一个刻本。此本刻成后便进呈内府，内府用黄绫封面进行装订，完全打扮成官书气度，庋于南宋皇家藏书楼缉熙殿。五十六年后，也就是到了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又经过装背人员检修过。今传世的宋版《文苑英华》卷231—240末有“景定元年十月初六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木记；卷251—260，271—280，291—300卷末有“景定元年十月廿五日王润照管讫”木记；卷601—610末有“景定元年十一月初一王润照管讫”木记；卷611—620，621—630，641—650，651—660卷末有“景定元年十月廿六日王润照管讫”木记可证。

三百六十三年后，《文苑英华》又有了第二个刻本，即明隆庆元年（1567）胡维新、戚继光刻本。关于明刻本的刻书缘起，有隆庆元年季夏穀旦赐进士中议大夫赞治尹奉敕巡抚福建地方兼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蜀汉涂泽民《刻文苑英华序》可以窥知一二。序谓：“侍御云屏胡君按部闽事，不浹月，既彬彬然祗于浚矣。迺尤雅意文教，购《文苑英华》缮本，檄福泉胡守帛、万守庆庀梓之。……工诏竣矣，佥谓业当有言以弁。”^⑤序中所指胡君即是胡维新，隆庆元年正月穀旦，又有赐进士第奉命巡按福建承事郎江西道监察御史姚江胡维新序。序称：“《文苑英华》者，为宋学士李昉、宋白辈奉敕辑次。书出于雍熙初，暨孝朝更命删校，反滋讹舛。至嘉泰之再雠，乃称全本。……丙寅岁，余祇命按闽，遣侍御颜君冲字，论文于武林道中，因语之曰，《苑》

之传也，宋有刻也。然藏之御府，昔非掌中秘之书者不获见，而今并逸之矣。……至六月入闽境，遂以白于督抚任斋涂公，嘉之赞决之，乃肇谋始役焉。……不数月，《苑》文刻成，孟诸公命副军金科告余竣事，并请序之。”^⑩这完全是武人弄墨，附庸风雅，钓誉沽名。此本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虽开板宏朗，行格考究，但底本仅是传抄本，且未经严格校勘，成书又仓猝，故讹文舛谬比比皆是。1939年冬天，傅增湘先生曾见过宋版《文苑英华》卷271—280一册百叶，并以此校隆庆本，结果校正了1181字，平均每叶有十八处错误，可见明本之伪劣。1966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文苑英华》便以此劣本为底本，盖亦出于无奈。但将现存宋版之《文苑英华》一百四十卷，分别影印到明本的相应卷第中，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这样做既无助于校勘，且大有明珠投暗之憾。

历史上《文苑英华》的传抄本不少，但抄得起这样一部大书的，不是贵族官僚，便是富商巨贾。这类人通常并不读书，更不会亲自动手抄书，抄好了也不过是插架点缀，满足附庸风雅的心理。抄书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便马虎从事，越错越多。傅增湘先生早年曾苦心搜讨几阅寒暑，汇校《文苑英华》。但由于校勘仍颇多遗漏，且不注据校出处，所以仍难以信为善本。现在古籍整理颇多热点，但《文苑英华》却无人下功夫核校，还赖今后有好古而又安贫乐道君子任斯役也。

四、宋版《文苑英华》的流传

南宋嘉泰间周必大主持校刻的《文苑英华》，当时不可能只印一部进呈内府，必是刷印多部流传于世。但由于八百年来来的天灾人祸、鼠啮霉侵，却没有一部流传下来。唯有当时进呈内府的那一部，由于戾于宫禁，常人无权问津，才得以部分保存，且流传至今。惜综计海内外所存，悉数不过十五册一百五十卷，只是

原书的百分之十五，且当中还有缺叶。然就是这仅存的十五册，却使我们得窥宋版风姿，亦显示出它在文字上的嘉善。

今传世的宋版《文苑英华》残册，每册首均钤有“内府文玺”，“御府图书”官印，证明宋时此书确是内府之物。册尾钤有“缉熙殿书籍印”，进一步证明此书宋时确为皇家藏书。南宋行在在临安（今杭州），缉熙殿便是行在宫内的藏书楼。所以可以明确地结论，传至今天的这部宋版《文苑英华》残册，最初是南宋政府的皇家之物。

元朝灭宋时，其游牧民族最初的粗放和破坏性，早已有了很大改变。攻城掠地之后，不但不再焚毁屠城，反而还实行了某些保护政策。例如当时临安存贮的某些书板，元时就都将其收集到西湖书院，并重整了一个西湖书院书目，便是他们重视文事的具体表现。也许是在这种政策的荫护下，宋时皇家的某些藏书也就得以保存。具体到这部宋版《文苑英华》在元时归哪里收藏，史无记载，更无藏书印鉴可证明，难以言状。

至明朝，此书又收藏于大内。先是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随着国都的北迁，南京文渊阁藏书也陆续运往北京。但书至北京后，北京故宫内的文渊阁还尚未建成，故书只好暂放在左顺门北廊。正统初，新的文渊阁落成，书要进阁列架，于是便由杨士奇领衔组织力量进行清点登录，最后于正统六年（1441）编成了一部簿录式的书目，名《文渊阁书目》。在现存的这部书目卷九文集百字号第一厨著录：

《文苑英华》一部一百二十四册，残缺；

《文苑英华》一部一百册，缺；

《文苑英华》一部一三册，缺；

《文苑英华》一部一五册，缺；塾本无。

《文苑英华》一部九十二册，缺；

《文苑英华辨证》一部四册，缺。

《文渊阁书目》所著录的这么多部《文苑英华》，不可能都是这个宋刻本，绝大多数都应该是传抄本，但当中的一百册、十五册、九十二册这三部中准定有一部是这个宋刻本。其中到底是哪一部，我推测那个只有十五册而通常塾中抄本又没有的一部，很可能就是这个宋刻本。

现存宋版《文苑英华》，每册几乎都钤有“晋府图书之印”“敬德堂章”、“子子孙孙永宝用”、“晋府书画之印”等印记，表明此书在明代曾是晋藩的架上之物。晋藩的封地在山西，朱元璋的第三子朱橚初封为晋王。宣德二年（1427）四月因事绝封。至英宗朱祁镇即位，即正统元年（1436）二月，又进封美圭为晋王，还居太原。正统六年（1441）美圭死，子朱钟铉嗣王位，弘治十五年（1502）死，在位长达六十一年。朱钟铉好文博古，喜书法，好收藏，曾采旧所藏古今名人墨迹摹刻以传，号《宝贤堂集古法帖》。上述宋版《文苑英华》所钤晋府印记，就都是他的藏书印鉴。问题是我们前边已说宋版《文苑英华》本是文渊阁旧物，那怎么又会传到山西晋府呢？这就还得谈一点明代的藩王政策。

封建社会的藩王问题，历来是封建君主十分棘手的问题。分封之国，容易酝成势力，威胁中央；分封不之国，一群王爷雄居京城，也经常制造事端。朱元璋荣登大宝之后，诸子封王之后则之国。之国时除应有的封赏外，还要赠送一些诗词歌赋、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用以陶冶他们的性情，消弥其犯上作乱的政治野心。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清梁清远《雕丘杂录》卷十五均说：“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其意盖为“教导不及，欲以声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入耳乎！”说明明代皇帝向藩王赠送文学作品，乃是祖制所遗。晋藩在宣德时曾因闹事而封绝，英宗时才获续封。新获封爵，进京朝谢，情理之常。进京朝谢时皇帝赠送宋版《文苑英华》，令其习学，也是

情理之常。所以文渊阁所藏宋刻《文苑英华》很有可能就是依照这样的事物逻辑流向了晋府。如果朱钟铉当年所得宋版《文苑英华》就真是《文渊阁书目》著录的那十五册，则宋刻《文苑英华》在明代前期就已大部分散佚，而仅存之十五册则自明以来便没再散佚。晋封绝于崇祯十四年（1641）的农民起义中。

入清之后，前明王府的旧物一般是要被视为公物的，黎民百姓是不敢随意破坏和据为己有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晋府所藏宋刻《文苑英华》在明清鼎革之后又重归内府，一直度于内阁大库。宣统三年（1911）清理内阁大库藏书，发现尚有卷601—700百卷十册宋版《文苑英华》存在，于是由清政府决定拨交给了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所以此百卷十册宋版《文苑英华》迄今仍珍藏在北京图书馆。

满清末造，政治腐败，国势衰微，呈现一片混乱败落景象。光绪三十年（1904），江苏宝应刘启瑞，字翰臣，号韩斋考取了进士。中进士后先后历官内阁中书和内阁侍读。这种官有条件接触内府藏书，乃至提阅内府藏书。满清朝官上班，依礼得穿相应品级的官服。刘启瑞这种官可能上班得骑马，还达不到坐轿。穿官服骑马，十分不便，于是便穿便服，官服则用一块包袱皮包着，由跟随的家丁拿着。到班上之后，换上官服，包起便服；下班时再脱下官服包起，换上便服出宫回家。就这个包袱给刘启瑞带来了拿书的方便。据说当时内阁藏书很混乱，没人管，刘启瑞便借机将一些书包在包袱里，携出宫外，带回家中，据为己有。宋版《文苑英华》五册五十卷就是这样被刘启瑞用包袱皮包回家的。

辛亥革命后，刘启瑞赋闲在家，其藏书开始陆续倩人过眼流出。据《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七记载，傅增湘先生于民国九年（1920）庚申四月，在宝应刘翰臣家见了宋版《文苑英华》卷251至260，271至280凡二十卷两册，并作了描述性记录。十年后，

也就是民国十九年（1930）庚午，傅增湘先生终于从颖川陈氏手中购置了卷251至260这十卷一册。前此一年，也就是民国十八年（1929）己巳十二月，傅增湘先生曾从天津周叔弢先生处借得宋版《文苑英华》卷231至240十卷一册，用以校正他自己手中的校勘底本。至此，证明民国九年傅氏在刘启瑞家所见到的两册二十卷，即231至240，251至260，到民国十七年以后已分别流出刘氏之手，并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周、傅两家先后捐归北京图书馆。民国二十八年（1939）己卯九月初八日，藏园老人傅增湘先生在校完八百三十多卷的明抄本《文苑英华》时，曾写下一篇很长的题记，描述其数载蒐求，丹黄手校之艰辛。其中说到自己“其后数年之中，又得见宋刊残本四帙，余幸分得一帙十卷”^⑦。这里所谓“又得见宋刊残本四帙”，上述所说已有三帙。即在刘启瑞家所见之卷251至260，271至280及从周叔弢处假归借校之卷231至240。那么还有一帙傅增湘先生也见过，而这一帙必为卷201至210或卷291—300当中的一帙。香港有位很有名的藏书家，名陈清华字澄中。在他的珍贵藏书中有两帙宋版《文苑英华》，这两帙正是卷201至210，291至300。五十年代，陈氏曾有一批善本书售归北京图书馆，其中卷291—300一帙宋版《文苑英华》，亦随之而来，归藏于北京图书馆。陈氏所藏之卷201—210一帙亦前后出手，归于香港敏求精舍主人王南屏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遂借以影印出版。而在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影印本上的第一叶钤有“祁阳陈澄中藏书记”印记。同时在书首有傅增湘手写题记：“闻颖川陈氏尚藏有一册。”可证傅增湘先生所见到的第四帙，便是卷201—210这一帙，否则当初怎么会往上面写题记呢？而他题记所说的“陈氏尚藏一册”，也一语中的，这一册便是卷291—300一帙。当这一帙傅先生推测而未见的宋版《文苑英华》归藏北京图书馆时，傅先生则墓木已拱，遗憾九泉了。

1995年嘉得秋季拍卖会所卖的那一册宋版《文苑英华》，正

是卷201—210这十卷一帙，且有抄配。这一帙，不但香港中文大学影印过，1966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文苑英华》时，其卷201—210也影印的是这个宋刻本。所以就文字内容而言，已并非希世罕见。而拍卖宣传中却隐去了这一节，以抬高其孤罕的版本身价。

值得指出的是，竞卖宣传中咬定传世宋版《文苑英华》只有十四册一百四十卷，北图已有十三册，若有此，便成完璧。这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傅增湘先生民国九年四月在宝应刘启瑞家还见过卷271—280。这十卷是否还在人寰？深藏何方？今年四月，赴台湾参加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其间曾参观访问中央研究院，于史语所陈列室说明书中，见其印有宋版《文苑英华》图版。回京后曾用几种放大镜审视，均看不清其藏印和卷第，故只好致函该院黄彰健院士。黄先生十分认真，经过目验查对，于5月30日复函。告知该院所藏宋版《文苑英华》为卷271—280。定为宋嘉泰内府刻本，无据。并抄示傅增湘先生民国二十八年（1939己卯在此册上的题记：“宋刊《文苑英华》自二百七十一卷起，至二百八十卷止，凡十卷，共一百叶。取隆庆刻本对校，凡补正一千一百八十一字。顷泽民兄假阅，因记此归之。己卯冬至日。”可证此册在三、四十年代仍在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曾有中央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这两个单位建立之后，在京、沪、宁倩人不遗余力地买书，这册宋版《文苑英华》就这样进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随其他藏品运往台湾。这一册书到台湾后真成了中秘之藏。既从未影印，也未公开宣传。致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该书时，也未能收录进去。

如此算来，宋版《文苑英华》迄今仍传世的还有十五册一百五十卷，而不是十四册一百四十卷。非常有意思，宣统三年清理内阁大库时，宋版《文苑英华》存卷601—700，凡百卷十册，卷第相联。而刘启瑞从宫中往出带书时，拿的都是不连续的卷帙。

一是那连续百卷可能不敢一次携出，二是刘翰臣毕竟是进士文人，不肯再将连续的卷帙人为地拆散，成为罪人。于是便演化出这么一段公案，使五册零帙至今还在演绎新的故事。

注：

①宋周必大《周益忠公·平园集序稿·文苑英华》卷十五

②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五

③《宋会要辑稿·编纂书籍》第五十六册

④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戊子十一月十三日》

⑤⑥⑦⑧《宋会要辑稿·勘书》第五十五册

⑨⑩⑪⑫同①

⑬宋周必大《周益忠公集》卷一百九十八

⑭《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九

⑮⑯明隆庆刻本《校刻文苑英华序》

⑰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文苑英华》卷十八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